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

朝戈金 主编

作为交流的口头艺术实践

——剑川白族石宝山歌会研究

朱 刚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

朝戈金 主编

作为交流的口头艺术实践

——剑川白族石宝山歌会研究

Verbal Art as Communication:
The Study on Shibaoshan Song-Fair of Bai People in Jianchuan

朱 刚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作为交流的口头艺术实践: 剑川白族石宝山歌会研究 / 朱刚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 - 7 - 5161 - 5781 - 7

I. ①作… II. ①朱… III. ①白族—民歌—业余音乐活动—研究—剑川县
IV. ①J607. 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987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金 沛
责任校对 高建春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2
字 数 348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编委会

主 编 朝戈金

编 委 卓新平 刘魁立 金 泽 吕 微 施爱东

巴莫曲布嫫 叶 涛 尹虎彬

总 序

自英国学者威廉·汤姆斯 (W. J. Thoms) 于 19 世纪中叶首创“民俗” (folk-lore) 一词以来, 国际民俗学形成了逾 160 年的学术传统。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80 多年来的发展几起几落, 其中数度元气大伤。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这一学科方得以逐步恢复。近年来, 随着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学理依据正是民俗和民俗学) 保护工作的重视和倡导, 民俗学研究及其学术共同体在民族文化振兴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 都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是中国民俗学开拓者顾颉刚、容肇祖等人长期工作的机构, 近年来又出现了一批较为活跃和有影响力的学者, 他们大都处于学术黄金年龄, 成果迭出, 质量颇高, 只是受既有学科分工和各研究所学术方向的制约, 他们的研究成果没能形成规模效应。为了部分改变这种局面, 经跨所民俗学者多次充分讨论, 大家都迫切希望以“中国民俗学前沿研究”为主题, 申请“院长学术基金”的资助, 以系列出版物的方式, 集中展示以我院学者为主的民俗学研究队伍的晚近学术成果。

这样一组著作, 计划命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

从内容方面说, 这套书意在优先支持我院民俗学者就民俗学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成果, 也特别鼓励田野研究报告、译著、论文集及珍贵资料辑刊等。经过大致摸底, 我们计划近期先推出下面几类著作: 优秀的专著和田野研究成果, 具有前瞻性、创新性、代表性的民俗学译著, 以及通过以书代刊的形式, 每年择选优秀的论文结集出版, 拟定名为《中国民俗学》 (*Journal of China Folkloristics*)。

那么, 为什么要专门整合这样一套书呢? 首先, 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

角度考虑,我们觉得,民俗学研究力量一直相对分散,未能充分形成集约效应,未能与平行学科保持有效而良好的互动,学界优秀的研究成果,也较少被本学科之外的学术领域所关注、进而引用和借鉴。其次,我国民俗学至今还没有一种学刊是国家级的或准国家级的核心刊物。全国社会科学刊物几乎都没有固定开设民俗学专栏或专题。与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国家级学刊繁荣的情形相比较,学科刊物的缺失,极大地制约了民俗学研究成果的发表,限定了民俗学成果的宣传、推广和影响力的发挥,严重阻碍了民俗学学术梯队的顺利建设。再者,如何与国际民俗学研究领域接轨,进而实现学术的本土化和研究范式的更新和转换,也是目前困扰学界的一大难题。因此,通过项目的组织运作,将欧美百年来民俗学研究学术史、经典著述、理论和方法乃至教学理念和典型教案引入我国,乃是引领国内相关学科发展方向的前瞻之举,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最后,近些年来,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推进,也频频推动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的适时调整,这就需要民俗学提供相应的学理依据和实践检验,并随时就我国民俗文化资源应用方面的诸多弊端,给出批评和建议。

从工作思路的角度考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着眼于国际、国内民俗学界的最新理论成果的整合、介绍、分析、评议和田野检验,集中推精品、推优品,有效地集合学术梯队,突破研究所和学科片的藩篱,强化学科发展的主导意识。

我们期待着为期三年的第一期目标实现后,再行设计二期规划,以利我院的民俗学研究实力和学科影响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确保我院的民俗学传统在代际学者之间不断传承和光大。本套书系的撰稿人,将主要来自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民俗学者们。

在此,我代表该书系的编辑委员会,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和院科研局对这个项目的支持,感谢“院长学术基金”的资助。

朝戈金

目 录

绪论	(1)
一 研究的缘起	(2)
二 研究方法	(8)
三 研究对象	(15)
四 研究过程	(18)
五 术语简释	(20)

上编 理论研究

第一章 石宝山歌会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29)
一 关于歌会的介绍性资料	(30)
二 歌会的历史文化探索	(34)
三 平行个案:以花儿研究为参考	(40)
四 其他理论著述	(43)
第二章 石宝山歌会研究的理论基础:语言转向	(53)
一 语言转向:20 世纪人文学术的重大变革	(53)
二 赫尔德奠定的语言转向因子	(61)
三 语言转向与语言学的范式革命	(70)
四 民俗学的学术史反思	(76)
第三章 石宝山歌会研究的新视野:以演述为中心的方法	(81)
一 民俗学范式转换的历史轨迹	(82)

二	演述的概念演进:从乔姆斯基到海默斯	(85)
三	演述之解析:以鲍曼为中心的视野	(89)
四	以演述为中心的民俗学方法的理论前景	(93)
 第四章 石宝山歌会研究的新视野:交流民族志		(97)
一	背景:言语研究的确立	(98)
二	言说民族志及基本观点	(103)
三	理论脉络:以 20 世纪 70 年代为中心	(105)
四	理论工具:言说模型	(110)
五	交流民族志对歌会研究的启发	(114)

下编 田野阐释

 第五章 石宝山歌会的历史与地理环境		(121)
一	历史沿革及地理环境	(122)
二	历史文献中的石宝山	(125)
三	歌会的人文地理空间	(129)
四	歌会与历史上的古道贸易	(136)
 第六章 石宝山歌会的地方性知识		(142)
一	民间传说中的歌会	(143)
二	歌会与农业生产	(152)
三	歌会的时间意义	(156)
四	歌会起源的批判视野	(163)
 第七章 石宝山歌会的交流民族志解析		(174)
一	歌会的环境和场景	(175)
二	歌会的文化规范	(183)
三	白曲的文类解读	(194)
四	白曲的口头诗学反思	(202)

第八章 石宝山歌会的交流事件分析	(207)
一 事件分析一:以 2006 年的个案为例	(207)
二 事件分析二:以 2008 年的个案为例	(222)
三 事件分析三:以 2012 年的个案为例	(238)
四 启示:歌会研究的几个误区	(255)
结语	(260)
参考文献	(265)
附录一 2008 年现场对歌选录一	(278)
附录二 2008 年现场对歌选录二	(285)
附录三 2008 年现场对歌选录三	(290)
附录四 田野日志选	(299)
后记	(314)

绪 论

作为剑川白族重要的文化空间，石宝山歌会历史久远、内涵丰富，传千百年而繁华之势依然。然而，如此富有特色的民俗生活事件，在各种历史的叙事或话语中却找不到与其地位相称的文献记录，我们很难通过书面资料来重构石宝山歌会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时，作为一宗活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石宝山歌会至今仍在剑川白族民众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白族人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一年不落地在赶会了。”这句谚语生动地说明，石宝山歌会是当地白族民众重要的文化空间，在年复一年的民俗生活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本书的写作，主要在于探索石宝山歌会的民俗内涵，阐释歌会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进而对石宝山歌会做出基本的界定：石宝山歌会是什么，它对当地白族民众具有怎样的意义？

回顾白族研究的学术史，“石宝山歌会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至今未有令人满意的解答。或者说，与该问题相关的历史文献和研究成果，大多为简单的资料记述或客位描写，系统研究或个案研究均匮乏，乃至采用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视野进行分析的成果亦属寥寥。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白族研究本身的边缘性，既无深厚的学术史积淀，也没有形成专门的研究力量，造成石宝山歌会研究成果乏善可陈，从数量和质量而言也无法与花儿会、歌圩研究等平行研究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前沿性的学术反思也鲜有涉及该话题的，进一步限制了歌会研究水平的提升。因此，基于民俗学的立场，本项研究试图通过多学科的视野，回顾民俗学研究范式的发展，把握现代民俗学理论在研究取向上的脉动，建构一种可行的歌会民俗研究新趋向：从交流的角度看待歌会（民俗）。具

言之,本研究将石宝山歌会视为民众的交流事件,^① 关注歌会语境下地方民众使用当地语言进行交流的过程。

下面分别对研究的缘起、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田野过程和术语简释几个部分进行交代。

一 研究的缘起

作为白族人,笔者很早就把石宝山歌会设立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但是,由于石宝山歌会研究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必须借助良好的课题设计对研究对象及研究范围加以限定,否则无从下手。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概念和实践在我国的进一步推广,我们发现石宝山歌会可以归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类别——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因此,我们在课题设计伊始就将石宝山歌会预设为文化空间,即文化表现形式(cultural expressive forms)与人文地理环境的统一,以此限定研究对象及研究范围。与之相对应,笔者早期主要侧重于文化表现形式即白曲的考察,并以特定村落为中心对白曲演述传统的内在机制展开了实地调研。在此期间,受惠于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创立和推广口头传统学科方面的相关实践,笔者接受了口头传统、口头诗学领域系统的学术训练,自此耳目一新,同时也为石宝山歌会研究扩展了新的研究角度。因此,笔者所从事的石宝山歌会研究,应该说主要得益于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创立国内口头传统学科的学术探索。

民族文学研究所开拓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努力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供职于民族文学研究所的数位学者,同时也是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的及门弟子,如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几位专于史诗研究的学者,在钟老门下接受了系统的民俗学训练之后相继负笈留洋,前往欧洲和北美的民俗学研究重镇(芬兰的国际民俗学者暑期学校、哈佛大学、密苏里大学等)访学。此后一段时期内,随着国外几代古典

^① 交流事件是本研究的关注重心,其含义与社会语言学研究中以“言语事件”“言语行为”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相一致。参见 Dell Hymes, *Founda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6, pp. 125 - 134。

学者传承的口头传统研究及其理论和方法论成果被陆续译介到了本土,^①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国内人文学术界率先引入了口头传统这一跨学科研究领域,并于2003年9月在国内首先成立了第一家“口头传统研究中心”^②。与此同时,西方口头传统的理论成果和方法论也进入了所内硕士、博士研究生必修课程,成为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生培养的一个特色。民族文学研究所培养研究生的基本思路,主要以传统为基础、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即研究生选择特定的口头传统,以导师启发的问题意识为指导,对演述事件进行民族志式的田野描述和基于口头诗学的文化阐释。研究生们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既有钟老扎根于鲜活的民间文化传统的基本态度,又有西方口头传统领域最为系统、最具前瞻性的理论反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中国民俗学的第一代学者、创立者钟敬文先生,他的民俗学思想传承到了第二代学者如朝戈金、尹虎彬、巴莫曲布嫫,已经实现了与国际主流话语和理论前沿的对接,完成了民俗学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转型和范式转换。^③

正是在硕士生导师巴莫曲布嫫教授的指导下,笔者完成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硕士学位论文《白曲演述传统初探——以剑川县石龙村的白库为例》。在该研究中,借助口头诗学中的“演述中的创编”^④(composition-in-performance)这一核心概念,我们对于白曲演述的口头诗学特征有

① 代表性的译著有:[美]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朝戈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美]阿尔伯特·洛德:《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姜德顺校,中华书局2003年版;[匈]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巴莫曲布嫫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朝戈金:《朝向21世纪的中国史诗学》,《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10年第1期,第139页。

③ 例如,《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一书以及其他实证研究,在冉皮勒研究中已经实现了从口头诗学的立场出发,围绕冉皮勒进行个案研究、文本诠释和传统重构,构成了中国史诗学研究的一道新图景。参见朝戈金《朝向21世纪的中国史诗学》,《国际博物馆》(中文版)2010年第1期,第138页;以及朝戈金《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46页。

④ “创编”一词乃中国学者对于帕里—洛德学说的发展,因其“composition”一词在英文中主要指创作,既可用于文人创作,又可用于口头诗人的演唱。而将其翻译为“创编”,既凸显了口头性与书面性的区别,又暗指了帕里—洛德学说中对于口头诗人创作技巧的洞悉——口头诗人正是使用传统的建筑单元才创造性地编制出个人之艺术大厦的。参见[美]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朝戈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由之也反思了口头诗歌中的“诗行”,绝非学者脑中抽象的文本化概念,而是一种交流的基本单位,其属性由歌手之间对话型的交流特征所决定。到了博士生学习阶段,导师朝戈金教授提示笔者不应拘泥于个案的分析和描述,要从更高的理论层面来思考石宝山歌会的个案对于民俗学理论研究的一般意义。因此,在前期白曲口头诗学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确立了口头诗歌即文化表现形式在石宝山歌会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并且将白曲这一口头文类(genre)的实践扩展为一种演述事件和交流事件,同时引入了交流民族志(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的理论模型,从言语事件的角度对石宝山歌会进行考察。在这种研究角度的限定之下,石宝山歌会研究也就进一步具化为,歌会情境中白族民众以传统诗歌作为交流资源而形成的言语事件(speech event)。这样,通过将前沿的口头传统理论方法引入石宝山歌会研究,以交流活动(事件)为关注对象,石宝山歌会中的口头艺术实践也就进一步被归入人类言语行为的范畴。这种研究设计也直接将石宝山歌会研究推至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话语的核心地带——民俗学中的特定文类,作为特定的言说方式,进入了人类言语行为研究的学术谱系。

不唯如此,导师朝戈金教授还提示笔者,应该关注国际民俗学发展的一般趋势,并在具体的研究中反思最新的理论动向。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笔者于2010年参加了芬兰民俗学暑期学校(FFSS),接触到国外同行对于民俗学发展趋势的理论探讨。2010届芬兰暑期学校的主题为“新民俗学之后?”(After the New Folkloristics?)标题中出现的问号,用意在于探讨超越“以演述为中心的方法”(the performance-centered approach)这一范式的可能性。但是,根据笔者的观察,所有参与该期暑校的民俗学者,他们的学术实践仍然与演述这一民俗学的主要范式不离关联。^①“所谓超越,更多的也是在前人基础上结合当下语境的重建而非彻底颠覆。”^②由此可见,当今民俗学研究的主要范式之一,仍以“演述”这一维度为出发点和主要特色。然而,这一西方的学术观念放入中国的语境,除了带来启发性的阐释效力,却也引发了不少困惑。首先,“演述理论”(the

① 从这一点来看,前文提及的中国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转型,与国外民俗学者基本的研究范式是一致的,均是以演述为中心的民俗学方法。

② 朱刚:《新民俗学之后?——2010年国际民俗学者组织暑期学校巡览》,载《中国民俗学》(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1—355页。

Performance Theory) 是否是一种成熟的研究范式, 国内外学者皆各持己见, 其理论限度未能得到进一步廓清。第二, 如何翻译“performance”一词, 中国学者也没有达成共识, 以致进一步的运用受到限制。这与国外同行面临的情况相似, “演述理论”至今没有形成典范式的研究成果。因此, 为了进一步明确当代民俗学发展到“以演述为中心”的范式的合理性, 笔者尝试从学术史的源流中回溯民俗学的演进轨迹, 而首要的问题当为如何理解“performance”。

“Performance”一词在国内民俗学界多译为“表演”, 这也是为大多数学术受众所熟知的一种译法。但由于汉语中的“表演”一词难以传达理查德·鲍曼 (Richard Bauman) 在其定义中专指的“一种口头语言交流的模式”^①, 有学者主张译为“演述”^②, 还有学者认为根本找不到准确的中文对译。故而, 在该术语的引入和翻译中, 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③ 实际上, 鲍曼本人对“performance”早已给出了界定, 即“performance”是语言运用的一种形式, 是一种言说 (speaking) 方式。^④ 鲍曼进一步论证, 民俗研究不一定非要文本出发, 然后将其重新放置于使用的情境中, 观察该过程中语言所展现的口头艺术特征, 应该将语言运用的方式视为根本。^⑤ 不论以何种译法为基准, 笔者认为必须要重新考虑这种认识角度的内在意涵和侧重点。因此, 回观相关学术史, 我们从民俗学研究中反思“performance”这一概念的先驱戴尔·海默斯 (Dell Hymes) 开始追溯, 海默斯对“performance”的重视, 正是源于其对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的批判。作为突破索绪尔 (Fernand de Saussure) 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语言 (langue) 和言语 (parole) 区分的划时代人物, 乔姆斯基提出的“语言能力” (competent) 和“语言运用” (perform-

① [美] 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 杨利慧、安德明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12 页。

② 在朝戈金、尹虎彬和巴莫曲布嫫等人的相关研究中, 他们对该词的使用也有前后的不同, 简言之, 从“表演”到“演述”的转换是显而易见的, 表明口头传统研究界已经注意到概念术语的审慎使用, 在讨论相关的学术渊源时, 他们都认为“言语行为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连接点。

③ 笔者认为, 就石宝山歌会研究而言, 或许“演述”一词更为合适, 因其“展演、表述”的内涵更符合白曲口头表达行为的实际特征。因此, 在本书中凡出现“演述”一词, 可对应英文“performance”。

④ 同①。

⑤ 同上。

ance) 两个概念,促使语言学从结构的描述进入了语法的描述,建构了关于言说者言语能力的一种理论学说,也就是使言说者能够生成和理解句子的一系列抽象法则。海默斯则批判了乔姆斯基对语言运用的忽视,他认为语言学应该重视真实语境下人们对语言的运用,从而使语言学摆脱了抽象的结构和语法分析。鲍曼承认海默斯的反思对他本人产生的影响,认为这是促使他形成民俗学中的演述观念的重要理论来源,尤其是“交流民族志”的相关洞见带给他的启发。国内民俗学界对海默斯的关注明显不够,而这一学术史研究中出现的缺环,对我们理解“以演述为中心的方法”构成了不小的障碍。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有必要对海默斯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从范式转换的层面提取民俗研究的思路,进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构建符合实际情况的田野阐释。上述是从语言学或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说明了重视语言运用的内在根由。应该明确的是,无论如何翻译,“performance”作为语言学或语用学概念被引入民俗学研究,指的是“语言运用”,而“以演述为中心的方法”的重要源头则是海默斯关注言语研究的相关理论学说。

对“语言运用”这一理论视角的再认识,除去民俗学内部的理论演进,我们还应当看到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语言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①与民俗学提倡的“以演述为中心的方法”,应该是一种学术思潮和具体表现的关系,也即民俗学研究在认识论上的转变受到人文社会科学总体思潮的影响并表现出这一特点。语言学转向是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最重大的事件,其实质在于从传统的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过渡。从英国分析哲学到德国现象学、存在哲学、阐释哲学,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到话语行为理论和解构理论,主体及意识的神圣性受到了普遍的怀疑,而主体存在、发生和发展的方式即语言性本质得到普遍关注,一场遍及人文科学各个领域的语言学范式转化得以实现。^②具体到民俗学内部,根据亨利·格拉西(Henry Glassie)的概括,20世纪的民俗学理论受到存在哲学和人类学的挤压,正是乔姆斯基、海默斯对

① 又译作“语言学转向”。笔者同意陈嘉映的观点,若从“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哲学”的演进来看,译作“语言转向”比较恰当。参见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② 朱刚:《民俗学的理论演进与现代人文学术的范式转换》,《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189—190页。

“performance”概念的提出和关注，才催生了“演述理论”的系统演成，进而化解了民俗学的理论困境，使得20世纪民俗学理论与之前的种种学说产生了巨大的差别，这说明语言学与民俗学在20世纪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同样，根据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的观察，语言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密切。他认为，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流派与现代哲学之间存在着共生的关系：如果没有现代分析哲学的基础及其逻辑数学的辅助，乔姆斯基的“转换一生成语法理论”就难以想象；同时，也正是由于语言学与哲学之间的密切联系，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作为与认识论乃至与逻辑相关的心灵理论才得以对现代分析哲学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语言转向”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如哲学、文学、史学等学科，“以演述为中心的方法”无疑也是这一思潮在民俗学研究领域的具体表现。

本书从民俗学的立场出发，主要关注石宝山歌会中地方民众的语言交流过程。站在这样的立场，从前述学术史的简要回顾来看，当属一种符合学术发展趋势的研究规划。进一步说，基于石宝山歌会研究长期滞后的现状，这种新视角的引入，或能有助于打开石宝山歌会研究的新视野。众所周知，石宝山歌会已被列入首批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及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回顾相关学术史，对石宝山歌会进行严肃乃至系统研究的成果在国内仍为数不多。放眼国际，也仅有个别日本学者对石宝山歌会中的白曲与日本古代文学做过比较研究，并附有一定数量的白曲文本记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有关于石宝山歌会的文字或研究，大多属于一种异域民族风情的介绍。大量带有偏见的标签如“白族狂欢节”“原始群婚制残余”“白族情人节”等被附会于这一传统事件上，令外界读者不免产生了歪曲的、不恰当的文化想象。因此，有必要从民俗学的角度出发对歌会进行系统而严肃的研究，还原石宝山歌会的实际面貌。如前所述，以文化表现形式和人文地理环境的二元统一透视歌会，从语言实际交流的角度出发，能够帮助我们将歌会的研究视野限定为交流事件（言语事件）及其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要素，对于研究假设的可操作化具有十分便利的作用。这也是本研究采取这种视角的基本考量。